

艺术与城市的对话

蒙特利尔与上海墙画双城记

◆ 卜 翌

蒙特利尔和上海,两座分处北美与亚洲的国际都市,拥有截然不同的历史积淀与城市气质,却在“墙画”这一城市公共艺术领域找到了独特的文化交集。墙画并不是简单的城市美化,更记录着时代的变迁、社群的诉求与艺术的生命力。

蒙特利尔因其一年一度的 Mural Festival(墙画艺术节)而闻名世界;而上海,则在城市更新和街区治理中,巧妙地将墙画融入了海派文化的脉络。

蒙特利尔的墙绘文化,很大程度上可追溯到街头艺术传统。然而,他们会着重指出,墙画(Mural)与涂鸦(Graffiti)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涂鸦大多未经许可,更多是个人“街头签名”,或亚文化表达,或单纯的“标记领地”,强调快速和风格化,常被清除或覆盖。而墙画往往经过合法许可,由艺术家受邀或委约创作,旨在公共美化、社区叙事和文化遗产,甚而具有明确的公共教育意义;注重构图、色彩、主题叙事和技术。墙画也常使用耐候材料,意图长期保留和保护。

蒙特利尔成功地原本边缘,甚至有争议的街头创作,通过艺术节形式的运作,使其产业化。自2013年创办以来,蒙特利尔墙画艺术节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墙画盛事之一。每年6月,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艺术家聚集在此城的主要街巷上现场创作,喷漆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色彩层叠地爬上墙面——不纯粹是创作过程展示,更是一个为期多日,集艺术、音乐、美食于一体的街头派对。同时,借由艺术的力量,将老旧甚至略显颓废的建筑立面,转化为斑斓的城市景观,提升了街区的经济活力和安全感。

在这些墙画中,加拿大艺术家 Kevin Ledo 创作的莱昂纳德·诺曼·科恩的巨幅肖像,堪称标志之一。这位音乐家、词曲作家、歌手、小说家、诗人、艺术家,正是出生于此城,被称为蒙特利尔之子。这幅高达二十层楼的墙画位于市中心,科恩双手交叠于胸前,神情宁静,仿佛以温柔的目光俯瞰整座城市。作品完成于他去世不久,画面温厚而庄重,成了蒙特利尔的精神地标。无论晴日或雪夜,抬头望见那张面孔,人们都会想起这座城市的诗意。而这类创作,牵涉到复杂的社会协调、资金筹集和技术挑战,其背后的故事——艺术家与城市、与逝去巨人的精神对话——本身就构成了引人入胜的叙事,据说整个过程也被拍摄成了纪录片。

这两年,蒙特利尔的“私人定制墙画之旅”尤为盛行,各国游客络绎不绝,跟随专业导览走街串巷地打卡,并深入品评背景故事、创作风格和技术。这些墙画作品遍布全城,在官方网站上年年有更新,注明编号、作品名称、艺术家和其简介,以及创作时期与地点。这些墙画跨越了艺术风格的界限,成为一个个网红地标——从超现实主义的奇幻,到几何抽象的解构,使得蒙特利尔真正实现了“全城就是一个艺术展”。

相较于蒙特利尔自下而上、由艺术节推动的墙画运动,上海的墙画艺术则更像是自上而下、经过精心规划与管理的城市“微更新”策略的一部分,持续且周密地服务于城市治理、街区主题打造和历史文化保护。

譬如在上海的黄浦区、静安区等核心区域,墙画的引入旨在提升街区“颜

值”和文化气息。此前著名漫画家 Tango 等艺术家的参与,曾为老城厢的墙画带来了独特的“海派幽默”。这些墙画出现在弄堂口、小巷深处或不显眼的转角,为闹市注入了人情味——一只猫、一盏灯、一位弯腰拾物的路人……画面轻巧,笔触幽默,却传达了生活的智慧,路过的市民见之总不禁会心一笑。

与蒙特利尔墙画追求的视觉冲击有所不同,上海的墙画更注重与街道尺度的和谐、与社群生活的互动,体现出另一种细腻的“烟火气”。

又诸如愚园路改造工程以墙画延续街区记忆,将历史典故、文化名人故事和现代艺术结合起来,起到了“历史导读”的作用。路人不必走进博物馆,就能在日常行走中获得历史文化的滋养。这种主题性的、有明确叙事指向的墙画,是上海城市管理者将艺术作为“文化基建”的成功实践。

而“为爱上色”ART+公益项目,则邀请国内外艺术家与设计,以“儿童关怀和环境动物保护”为主题进行墙绘创作。在去年完成的沪上项目中,就携手艺术家陈十三,在人民路打造了一座55米高的墙绘巨作《露香春景》,覆盖了整栋楼17层的外墙。画面中,“细巧巢窝紫乳燕,家园如画满春山”的国风意境铺展,让原本有些陈旧的人民大楼迎来了“诗意新生”,更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的驻足。艺术家希望通过这幅作品唤起人们对自然之美的共鸣,珍惜和谐共生的环境。墙绘既与老城厢相邻,又和东方明珠及周边现代建筑相映成趣,极为契合海派美学和城市风尚。

除了这些知名街区与艺术家项目,上海还有许多社区共创的墙画计划,这些在地创作更注重艺术与社区间的融合和修补。徐汇衡复片区、浦东公园步道、北外滩滨江区域等等,都有民众和艺术家共同完成的墙绘。画面题材广泛涉及生态、童趣,和城市记忆,素朴却真切地反映了城市情感的细节。

而在云间粮仓、M50创意园等由工业遗存改造而来的文化创意园区,墙画的实验性更强。高大的筒仓、斑驳的仓库外墙,都成了墙画的最佳载体。艺术家们在这里可以进行更大胆的创作,表达对工业文明、城市变迁的思考。这些作品更贴近当代艺术的范畴,形成了空间叙事的一部分,旨在营造氛围,吸引年轻人群和创意产业入驻。

蒙特利尔和上海的墙画艺术,虽表现形式不同,但都体现了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两座城市的墙画也都体现了对各自文化身份的探索,以及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的对话。墙画已成为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场所,打破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而这种艺术的民主化,也令城市文化更加多元和包容。

墙画改变了城市,也改变了人们看待城市的方式。颜料会褪色、墙体会老去,但故事与情感会留下。墙画成了连接艺术与公众、历史与现代、个体与社群的有力媒介。两座城市在不同纬度以同样的方式彼此呼应:艺术不是装饰生活,而是让生活本身成为艺术。



被「邪修」的瓦格纳

——《漂泊的荷兰人》
黄丽珈

看完刚刚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由建团350年的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带来的、瓦格纳第一部树立自己独特“革新乐剧”风格的歌剧作品《漂泊的荷兰人》,我不得不佩服德国人的脑洞、后当代的剧本改编和导演展现形式,让这部已经诞生了180年的浪漫主义的歌剧作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贡献了社交媒体的热议。

由弗拉基米尔·尤罗夫斯基担任指挥的巴伐利亚国家管弦乐团的深情现场伴奏,联手马尔特曼、华莱士领衔出演的荷兰人和森塔完美地诠释的感人肺腑和直冲天灵盖的男中音及女高音,让上海的观众纷纷感叹吃到了“细糠”。但是导演彼得·康维奇在21年前的改编,尤其是第二幕动感单车的展示,又让人忍俊不禁,低声感叹这是我们能看的吗?莫不是“邪修”了瓦格纳。典型荷兰画派的云的舞台背景和名画《夜巡》这样的服化加持,单腿上身重计、永远摇摆的路灯和带有危险品标识的炸药桶这样不普通的道具和动作细节,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当代观众的跳脱精神状态和超前混搭。

《漂泊的荷兰人》是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创作的三幕歌剧,是一部有其浓郁个人经历的重要早期里程碑之作。歌剧的核心故事源自欧洲流传数百年的“幽灵船”,传说的核心是一位被诅咒的航海者:荷兰船长因亵渎神明,被上帝判处永恒惩罚,终身驾驶幽灵船在海上漂泊,每7年才能靠岸一次,只有找到一位对他绝对忠诚的女子,诅咒才能解除。若女子背叛,诅咒将永远生效。这也正是后来一系列由强尼·德普主演的好莱坞电影《加勒比海盗》的原型故事。在电影中,这艘船和它的船长戴维·琼斯,就是《漂泊的荷兰人》神话的直系后裔。值得一提的是《加勒比海盗》电影配曲的作曲汉斯·季默也是德国人,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瓦格纳这部《漂泊的荷兰人》作品的影响,在最新上映的音乐会电影《汉斯·季默和他的朋友们》中,在具有主导意识的音乐故事线中,他甚至讲到如何一夜之间用音乐创造出一个历经风霜、沉重但也带有一些调皮的海盗船长,这也可以被看作两位音乐人在隔空180年间的一种创作呼应。

《漂泊的荷兰人》创作于1839—1841年之间,正是瓦格纳人生中最困顿的阶段。他因为欠下巨额债务,被迫与妻子逃亡,计划经海路前往伦敦,再到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心巴黎。巨浪滔天和船只飘摇的切身感受,让他对海洋的狂暴与终极的孤独有了极致体验,直接转化为歌剧第一幕中幽灵船与挪威船在风暴中相遇的震撼场景。因为早年创作的《仙女》等作品并未获得任何关注和成就,他在精神上的孤独感,尤其是对浪漫主义艺术的革新理想与当时欧洲歌剧界以威尔第为代表的意

大利歌剧的炫技和商业成功格格不入,让其精神漂泊感与“荷兰人”的永恒诅咒形成镜像:“荷兰人”渴望获得少女无条件忠诚的爱以解除命运的诅咒,瓦格纳则渴望获得观众对自己艺术的共鸣以排解精神上的孤独。歌剧中女主角森塔对荷兰人献祭生命表达的忠诚,本质是瓦格纳对艺术知音的理想投射。

我们无法听到瓦格纳当时创作的心境,但是在汉斯·季默的电影中,我们听到讲述故事的人反复提到寓言故事,那些简单,但是让人思考的故事,带有一种高于现实的命运的预示性。海洋是命运的化身,风暴代表诅咒的狂暴,平静代表短暂的希望和浪漫想象的投射,用自然的极端对比隐喻人物的悲剧命运。“幽灵船”“永恒的诅咒”“少女殉情救赎”等元素,打破了古典主义的理性与和谐,成为浪漫主义歌剧的典型范式。它是对“流浪与救赎”这一人类永恒主题的探讨,也是瓦格纳艺术理想的第一次集中爆发。

同时,这部作品还不断影响着后世的作品,比如《丁丁历险记》。

《丁丁历险记》作者埃尔热本人就是一位古典音乐和歌剧爱好者。在他笔下的哈尔卡斯船长就是一位狂热的《漂泊的荷兰人》粉丝。他的许多背景和特色,如与大海搏斗的经历,暴躁但善良的内心等,都与《漂泊的荷兰人》中的荷兰船长有某种精神上的共鸣。当他和丁丁在海上寻找沉船时,他反复地哼唱“荷兰人”的咏叹调“Die Frist ist um”(期限已到)。这首咏叹调完美地映衬了哈尔卡斯当时在茫茫大海上追寻祖先宝藏的复杂心境。就连卡尔库鲁斯教授的管家内斯特的太太,也被塑造成一位世界著名的歌剧女高音。在故事里,她多次演唱剧中森塔的咏叹调,其高亢的嗓音甚至具有“震碎玻璃”的威力。因此,每当森塔扮演者华莱士一开金嗓,我的脑海中就出现内斯特太太的漫画形象,挥之不去。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版《漂泊的荷兰人》在上海的首次演出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除了是因为演出的诚意:百位演出人员,近10吨的舞台装置,高质量的演奏和演出外,也是因为当代都市人对流浪漂泊感的精神共鸣。

在一个以光速变化的超级大都市里,目标永远在前方,永远有下一个岸要抵达,但抵达后往往发现那只是另一个航行的起点。这种永不停歇的追逐,与荷兰人无法解除的诅咒有异曲同工之处。“荷兰人”的救赎是真爱、森塔。我们的是什么?当森塔点燃了炸药桶,我笑了,不是对于魔改的不解,对于真爱自体性的觉醒。

我们是荷兰人,也是森塔,每一个都有着对理想伴侣、生活目标的梦幻想法,但是生命本身的脆弱和不可控,有时会把梦想砸碎,但是你会发现,生活还在继续,甚至以一种更好的方式。

